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孙政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对中国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作用都是显著的。

第一章讨论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形成和实践了“广土众民之志”“化家为国”“因俗而治”以及“分而治之”等思想观点，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辽朝初期，契丹统治阶级对一些民族问题的认识出现分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思想流派：一是以旧制为依托，坚持草原本位主张的保守派；二是慕中华风俗，积极介入中原事务的开明派。双方的矛盾常常随时局变化而激化，彼此间斗争的结果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

第二章论述辽景宗至辽兴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辽景宗借鉴汉族统治者的经验治国，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在对宋关系方面，前期以和为贵；后期挫败宋太宗的北伐，转而进行报复性的南侵。辽景宗统治时期，境内的汉族士人大多已经摆脱华夷之辨的束缚，视辽朝为安身立命之所。萧绰倾向汉化，促进了辽朝的封建化。战胜“雍熙北伐”后，萧绰和辽圣宗产生了“压制北宋”的思想，经过长期对抗，在“以战促和”思想指导下，逼迫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辽圣宗钦慕华风，重用汉臣，在与北宋和平相处的同时，不

断向周邻扩张。辽兴宗虽胁迫北宋增加岁币，但总体上珍惜双方的和平，为遏制西夏势力的扩张，他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辽兴宗不甘心被视为“夷狄”，努力提高辽朝的正统地位。由于辽朝统治者穷兵黩武，造成民生困弊，萧韩家奴产生了不事四夷的思想。

第三章论述辽道宗和天祚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辽道宗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义若一家”和“示信以怀远方”等观点构成，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由于他为政昏聩导致国势衰落，以致其思想的价值长期被忽视。天祚帝在民族关系思想方面的失误，是其沦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他以正统自矜，轻视女真崛起，致使局势失控；又狭隘多疑，造成了契丹内部分裂，企图依靠高丽、西夏抗金的想法也落了空；天祚帝弃军民而自为谋身计，最终国破家亡。

第四章涉及金太祖和金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完颜阿骨打的民族关系思想包括“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欲中外一统”“天下一家”以及“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等观点。他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使女真人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灭辽和北宋的基础。金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有一个从“一依本朝旧制”到“威制中国”的转变过程。在批判其侵略扩张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完颜宗翰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追求女真独立以及从支持海上之盟到伐宋问罪再到徐图统一的思想变化。完颜宗弼无论是主和或主战，都是从金朝的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的结果。

第五章范围是金熙宗至金章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金熙宗的

前 言

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由“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渐祈胥效，翕至大同”“柔宋人而息兵戈”等观点构成，在政治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奠定了金宋和平相处的基础。完颜亮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朕以天下为家，固无远迩之异”和“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两个观点支撑，在理论上达到了金朝时期的高峰，但因实践的时机、方法和策略不当而导致失败。金世宗总结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形成了“以仁易暴，休息斯民”“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女真为本”等思想观点。他的思想存在矛盾性，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金章宗“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对金与南宋之间的关系以大体为重，挫败韩侂胄“开禧北伐”，达成“嘉定和议”，经略北疆，使金朝进入了鼎盛时期。

第六章讨论卫绍王至金哀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卫绍王在蒙古进攻西夏时，坚持“敌人相攻，吾国之福”的观点，不肯出兵援助；在抗击蒙古入侵时持消极御敌的思想，导致“身弑国蹙”的悲剧结局。金宣宗民族关系思想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是其未能中兴金朝的原因之一。面对成吉思汗入侵，金宣宗奉行消极避让的思想。大敌当前，金宣宗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国势日衰。金哀宗纠正了金宣宗民族关系思想的偏差，停止侵宋，与西夏议和，从而能集中力量抵御蒙古入侵。虽然未能挽回亡国的结局，但其思想的价值应该予以肯定。

第七章对辽金民族关系思想进行比较和评价。辽金对中国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相似性，但在统治民族发展的定位和对正统的追求上有所不同。辽金民族关系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推动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善而成的，也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断代史成果之一。由于多方面原因，书中难免存在不是之处，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22年3月

绪 论	001
一、研究背景	001
二、研究现状	004
三、研究方法	006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007
第一章 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009
第一节 辽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009
第二节 辽朝初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两大流派	024
第二章 辽景宗至辽兴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039
第一节 辽景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039
第二节 萧绰的民族关系思想	055
第三节 辽圣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077
第四节 辽兴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096
第三章 辽道宗和天祚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115
第一节 辽道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115
第二节 天祚帝的民族关系思想	128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第四章	金太祖和金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141
第一节	完颜阿骨打的民族关系思想	141
第二节	金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157
第三节	完颜宗翰的民族关系思想	167
第四节	完颜宗弼的民族关系思想	177
第五章	金熙宗至金章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185
第一节	金熙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185
第二节	完颜亮的民族关系思想	194
第三节	金世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209
第四节	金章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225
第六章	卫绍王至金哀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239
第一节	卫绍王的民族关系思想	239
第二节	金宣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244
第三节	金哀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254
第七章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的比较和评价	260
第一节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比较	260
第二节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评价	274
参考文献		281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在学术界的相关论著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不同学者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民族问题时会使用不同的概念，诸如“民族观”“民族史观”“民族思想”“族群观”“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关系思想”等。“民族关系思想”概念作为其中之一，虽然出现较晚，但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几乎所有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其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结和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①

1988年，崔明德教授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在学界最早提出了“民族关系思想”的概念，次年又发表《应当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建议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1998年，崔明德教授发表《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的构想》，呼吁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其后十几年里，崔明德教授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等一系列文章中，对民族关系思想的定义、研究范围、发展脉络、研究方法进行了科学的界定，

^①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68页。

构建了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理论与研究框架。

在这些文章中，崔明德教授对开展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一，从知行关系来看，一般来说，应是先有思想后有实践行动，思想决定或影响着行动，一切行为、政策、策略和方案都是在一定的意念和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涉及到民族关系的事件及政策，都离不开历史人物对民族关系的思考与认识。第二，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既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又能丰富中国思想史。第三，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第四，从国内外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五，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当前制定民族政策、处理现实的民族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第六，这是进一步繁荣学术研究事业的需要。^①

近年来，民族关系思想概念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学术界在民族关系思想领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范围尚不够宽广，对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时代和代表性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还缺乏系统梳理与深入发掘。

10世纪初到13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秦汉形成以后经历的第二次大分裂阶段，也是中华各族迭起竞相建立政权的时期。在此之前，由于唐王朝开明的民族关系思想和民族政策的影响，各部族均获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当唐朝衰落后，诸族纷纷谋求更大的发展。北方的契丹族和女真族表现得最为活跃，成就也最大。他们建立的辽朝和金朝，疆域不断扩大，先后与中原王朝对峙，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

^①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绪论

第二个南北朝的局面。虽然他们相互之间的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彼此的交往也促进了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学习和融合，为中国更高层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辽朝在 200 多年间，“不仅第一次将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各民族统一起来，而且还第一次打破了长城的阻隔，汉人北迁，北方民族南迁，将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结合为一体……契丹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为后世祖国各朝统治者留下一份珍贵遗产，丰富了祖国的灿烂文化。所有这些，为祖国各民族再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①。金朝“既大大推动了女真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在巩固祖国北部统一，发展北方社会经济，促进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②。从这一点来看，经过这次分裂后，我国再没有出现过大的长时间的分裂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一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聚力进一步加强的结果。

以往学界的众多学者已充分认识到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价值，已就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诸多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指导着辽金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系统研究，这是一大缺憾。辽金作为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王朝，长期处于大动荡、大融合、大发展时代，各民族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辽金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史学家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结合自身情况进行的创新都是显著的，内容非常丰富，影响也十分深远，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这些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积极开展对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当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制定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族政策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将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二、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对象已涉及刘敬、臧衍、吕雉、汉文帝、贾谊、中行说、晁错、汉武帝、司马相如、刘安、张骞、司马迁、汉宣帝、赵充国、魏相、萧望之、贾捐之、谷吉、陈汤、汉哀帝、杨雄、王舜、刘欣、王莽、严尤、班彪、班固、班超、班勇、梁商、李固、皇甫规、宋文帝、隋文帝、长孙晟、梁睿、薛道衡、隋炀帝、裴矩、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狄仁杰、郭元振、唐玄宗、唐德宗、李泌、陆贽、韦皋、杜佑、唐宪宗、李绛、白居易、韩愈、唐文宗、唐宣宗、李德裕、牛僧孺、杜牧、程宴、牛丛、司马光、王安石、丘浚、杨应琚、魏源、冒顿、赵佗、呼韩邪、苻坚、耶律阿保机、辽兴宗和突厥、吐蕃、回纥、南诏、唐时西域诸国历代首领等的民族关系思想。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①和《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②等专著。

另一方面,涉及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陈述先生在《契丹政治史稿》第五篇《阿保机建国的基本情况及其政策》指出,阿保机广揽汉人,以实新国,对于被征服的人们,迁徙参合,以收防范融化之功。至于部落之间,则因势利导,以强干弱枝。基本上因俗而治。第六篇《统治政策的演变与汉人地位的提高》认为历穆宗而世宗,采取草原保守政策。周复三关,实际得自契丹政策方面的便利是很大的。景宗即位时期,已稍改此策,宋廷不得不纳币结盟,铸成南北朝的局面。兴宗而下,已经无别于汉家的太平天子。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金朝断代史。书中对争议比较大的宗弼、完颜亮等人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陶晋生先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集中了他多年来研究宋辽外交关系的成果,囊括宋辽间关系的各个层面。内容包括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平等的外交关系、经济文化交

绪论

流等。赵永春先生在《金宋关系史》中指出金“在整个宋金交往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论述了和平相处是金宋关系的主流，提出广义民族英雄和狭义民族英雄的见解。李桂芝教授的《辽金简史》对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特别是辽金与两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杨树森先生的《辽史简编》和舒焚先生的《辽史稿》是两部通行的辽朝断代史，其中有章节对辽朝的民族关系进行叙述和解读。邓广铭先生主编的《辽宋西夏金史》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分册，李锡厚、白滨先生的《辽金西夏史》是《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第七卷，两部著作都有相应的章节系统论述了辽金的民族关系。陈佳华先生主编的《宋辽金时期民族史》涵盖宋辽金时期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了各族人民和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等诸方面。

辽金史研究既属于中国断代史研究的范畴，也属于民族史研究的范畴。随着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对辽金史的专题研究硕果累累。例如崔明德先生的《辽朝和亲初探》，乔幼梅先生的《论女真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演变》，任崇岳先生的《略论辽朝与五代的关系》，孟古托力先生的《辽代东北亚各国关系述论》《金朝儒家民族观探微——金以前儒家民族观发展的历史轨迹》《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周峰先生的《辽代治边三题》《试论金朝对西部边疆的经略——以西夏和西辽为中心》，武玉环教授的《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程妮娜教授的《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礼制度研究》，郭康松先生的《辽朝夷夏观的演变》，刘浦江先生的《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郑川水先生的《辽圣宗及辽与高丽藩交考略》，宋德金先生的《大金覆亡辨》《金代社会与传统中国》，赵永春先生的《金世宗对宋议和述论》《金熙宗对宋政策的转变及其作用》《论金熙宗的改革》《试论金人的“中国观”》，刘建丽教授的《略论西夏与金朝的关系》，等等。尽管这些文章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但资料之翔实、考证之严谨、立意之高远，无疑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极好的典范。

此外，外国研究者尤其是日本学者也对辽金史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如爱宕松男的《契丹古代史研究》，岛田正郎的《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三上次男的《金史研究》，田村实造的《金朝通史》，等等。傅海波和崔瑞德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它在叙述辽、西夏、金、元的历史时，深入研究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外国研究者的一些观点，如征服王朝论等还有待商榷，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应得到重视和借鉴。

三、研究方法

本书所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一些。

(1) 充分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文献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的相关资料散见于各种历史文献之中，因此必须充分搜集资料，从中整理并深入分析和阐释，力求全面展现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的真实面貌。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当属元顺帝时宰相脱脱等人奉敕所撰之纪传体史书，名列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中的《辽史》《宋史》《金史》。主要的历史文献还有：《契丹国志》《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全辽金文》《辽史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宋朝诸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西夏书事》《高丽史》《元史》等；此外，宋人出使辽金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奏章和金人笔记、文集等也多有关于辽金史事的记录，是对辽金史研究

绪论

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如《武溪集》《栾城集》《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松漠纪闻》《靖康稗史笺证》《揽辔录》《鄱阳集》《容斋随笔》《归潜志》，等等。

(2) 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及思想史、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儒学史、中外关系史等密切相关，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既需要吸收上述学科中的研究力量，又要借助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①因此，本书运用了民族学、历史学、思想史、中外关系史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3)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所谓历史的即指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而逻辑的即指理论，就是对客观进程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要求我们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历史的结论就是逻辑的结论。”^②本书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全面审视和正确把握辽金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基础上，深入阐述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历程。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隋唐时期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成熟时期。”“宋元明清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的时期。”^③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正处于两者的转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①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77页。

②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77页。

③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70页。

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本书拟在深入研读古代文献资料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辽金民族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

其一，研究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及条件。

其二，研究辽金时期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实践。

其三，研究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与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渊源。

其四，研究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

其五，研究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流派的交锋。

其六，研究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实践成效、价值、影响及历史局限。

研究难点有二：

一是相关史料的匮乏。一方面，建立辽的契丹和建立金的女真族因其文化背景原因，很少直接对历史上和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反思、总结及预见，史书上留下的多是他们实践活动的记载，这样就只能依据他们的活动来分析和阐释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辽金、金元更替之际，战乱频仍，官私著述，流散殆尽。而研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书（宋、辽、金三史），由于正统之争，体例一直不能确定，至元之季世，史官们才仓促命笔，潦草了事，失误甚多。尤其是《辽史》一书，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局编修，次年三月成书，时间短促，缺乏周密安排和详审考订，因而内容贫乏，自相抵牾之处屡见不鲜，如纪年错误，记事矛盾、疏失，史事错误，译名混乱，一人两传等，尤为世人诟病。

二是这个课题本身具有相当的难度。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的研究领域，对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但需要研究者掌握民族学、历史学、思想史、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还需要研究者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本人的理论水平和学识尚有很大的不足，相关问题只待后续进一步完善。

第一章

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第一节 辽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辽太祖即耶律阿保机（872—926年），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治家、军事家。他是辽王朝的缔造者，推动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耶律阿保机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广土众民之志”“化家为国”“因俗而治”，以及“分而治之”“远交近攻”等内容。

一、“广土众民之志”

“广土众民”，出自《孟子·尽心上》^①，即使土地广阔、人民众多之意，这是古代任何一个民族要在严酷的民族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契丹源出鲜卑宇文部。北魏登国三年（388年），道武帝拓跋珪击破鲜卑宇文部，契丹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周旋于中原王朝和草原霸主之间，实力逐渐增长。9世纪后期，唐帝国衰落，回鹘汗国分裂。契丹首领趁机四处掠夺奴隶、畜产和财物，成为一个强大的征服力量。史载：“光启中，其王沁丹者，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达靺、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浸盛，有时入寇。”^②阿

① 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第十三上《尽心·章句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

②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27页。

保机的伯父释鲁当政后，野心进一步膨胀，“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①因此，阿保机“广土众民”的思想是继承父祖遗志而来的。

自青年时代任侍卫军官挾马狝沙里，阿保机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唐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被推举为迭刺部夷离堇，专征讨。天复三年（903年），阿保机任于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时，唐王朝的统治早已风雨飘摇，朱温、李克用等强藩忙于争夺中央权力；草原其他部族不是正处于衰落期，就是还比较弱小；东北的渤海政权也走向了腐朽没落。这样的外部环境为阿保机“广土众民”思想的实践提供了有利时机。

阿保机“广土众民”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天复元年（901年）到天祐三年（906年），是阿保机为取代遥辇氏积聚力量的阶段。史籍上对他这一时期活动的记述充斥着“俘获”等字眼。阿保机连年向周边游牧部族和唐北部边境用兵，掠夺了大量人口和财富，个人实力和威望急剧膨胀。如：

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刺哥，俘获甚众”。

天复二年（902年）秋七月，阿保机伐河东代北，“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

天复三年（903年）春，阿保机伐獯，“获其户三百”。冬十月，略薊北，“俘获以还”。

天祐二年（905年），阿保机进军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②

第二个阶段，从太祖元年（907年）到太祖九年（915年），是阿保机开疆拓土的阶段。

首先，阿保机已经不满足于俘掠，而是要确认攻下的地区为自己的统

① 脱脱：《辽史》卷2《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页。

② 《辽史》卷1《太祖上》，第1-2页。

治范围了。太祖元年（907年）二月，阿保机出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次年，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四年（910年）冬十月，平乌马山奚叛乱；五年（911年）春正月，阿保机亲征西部奚，“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复“略地蓟州”；六年（912年）秋七月，“亲征术不姑，降之”；^①九年（915年）春正月，平乌古部叛乱。阿保机陆续征服了黑车子室韦、吐谷浑、乌丸、奚、霫、乌古等部族，“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②

其次，时值朱温篡唐，藩镇斗争加剧，阿保机利用各方相持不下之机，积极插手中原事务，收渔人之利。太祖元年（907年），刘守光囚禁其父仁恭，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其兄刘守奇率数千人投降契丹，阿保机置之平卢城。三年（909年），刘守光兄沧州节度使刘守文遣人来求援。阿保机命耶律苏、萧敌鲁等相助，败守光军。六年（912年）二月，阿保机亲自出征刘守光。虽然早在唐天祐二年（905年）阿保机即与李克用会盟共抗朱温，但当朱温自立为帝，遣使来聘时，他看到朱温声势日盛，遂奉表称臣，约定联合灭晋。对偏处东南的吴越，阿保机也交往甚密。为获取最大的利益，阿保机奉行远交近攻策略，根据形势变化随时更换盟友。

最后，由于受到“诸弟之乱”等内部矛盾的牵制，阿保机一度放慢了对外扩张的步伐。阿保机成为契丹最高首领后，试图建立中原式的专制王朝，遭到了一些家族成员的激烈反对。以阿保机诸弟为代表的保守派先后发动了多次政变，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阿保机的力量。经过一番波折，契丹物价腾贵，牲畜疫死，昔日“富有万马”的契丹民间，竟落到皆徒步而行的凄惨境地。在一段时间里，阿保机不得不“弭兵轻赋，专意于农”^③，把精力集中到内部的治理整顿和

① 《辽史》卷1《太祖上》，第3-6页。

② 《辽史》卷1《太祖上》，第4-5页。

③ 《辽史》卷59《食货志上》，第924页。

恢复生产上。

第三个阶段，从神册元年（916年）到天赞五年（926年），是阿保机“广土众民”思想升华的阶段。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契丹国内局势趋于稳定，随着地位的巩固和国力的上升，阿保机已不满足于仅做一个草原上的霸主，而要建立一个疆域囊括整个中国北部的强大王朝。

一方面，阿保机立志“为群方之父母”，加快征服草原各部的步伐，巩固对已降附部族和地区的统治。神册元年（916年）秋七月壬申，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年羊不可胜算”。二年（917年），萧室鲁平定于骨里叛乱。^①四年（919年），阿保机征乌古部，“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自是举部来附。”五年（920年）秋八月，阿保机亲征党项诸部。^②天赞二年（923年）三月戊寅，阿保机军于箭筈山，讨伐奚胡损部，“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置奚堕瑰部，以勃鲁恩权总其事”。^③

另一方面，逐鹿中原的各大势力频繁的拉拢阿保机，企图借契丹之力削弱竞争对手。而中原“诸藩雾暗，五岳尘氛，赤县成墟，紫宸迁宅”^④的衰落景象也刺激了阿保机向南扩张的野心。这一时期，阿保机对中原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

神册元年（916年）夏四月，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降附契丹，阿保机任其为幽州兵马留后。八月，阿保机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设置西南面招讨司。

① 《辽史》卷1《太祖上》，第11-12页。

② 《辽史》卷2《太祖下》，第15-16页。

③ 《辽史》卷2《太祖下》，第18页。

④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太祖大圣皇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第一章 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二年(917年)春二月,晋将卢文进投降契丹。三月辛亥,攻幽州……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

三年(918年),耶律安端攻云州及西南诸部。^①

五年(920年),耶律倍等略地云内、天德。冬十月辛未,攻天德……丙子,拔其城,擒宋瑤,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②

神册六年(921年),李存勖征讨张文礼,王郁游说契丹出兵解围。阿保机空国入寇,与李存勖会战于沙河、望都,战况不利,“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③被迫撤军。阿保机虽无所而归,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志。当后唐明宗李嗣源遣姚坤出使契丹时,阿保机蛮横得以“吾以甲马三万会新天子幽、镇之间,共为盟约”相威胁,宣称“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在姚坤断然拒绝后,他又表示:“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④

经过多次失利,阿保机认识到契丹国力尚不足以逐鹿中原,遂转向彻底吞并草原诸部和渤海,欲待羽翼丰满再择机南下。天赞三年(924年)六月,阿保机大举出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古回鹘城,西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天赞四年(925年),阿保机宣布“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⑤举兵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年)围攻忽汗城,渤海国王大諲湮出降。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将渤海故地纳入契丹统治。

经数十年东征西讨,阿保机终于实现了“广土众民”的思想,将版图扩展到“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⑥的辽阔区域。

① 《辽史》卷2《太祖下》,第11-12页。

② 《辽史》卷2《太祖下》,第16页。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龙德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873页。

④ 《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天成元年,第8989页。

⑤ 《辽史》卷2《太祖下》,第21页。

⑥ 《辽史》卷2《太祖下》,第24页。

二、“化家为国”

所谓“化家为国”，就是从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转换到以国家利益为重，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契丹从宇文部析出后，就开始向国家的过渡。但是它在役属于柔然、突厥和回纥等草原霸主时，备受欺凌；归附中原王朝期间，也屡因不顺从而受到压制。遭受了多次沉重打击后，这个过渡变得非常缓慢。

遥辇氏联盟后期，随着契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部落社会残存的平均观念，越来越被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私有制观念所取代，阶级分化加剧，贵族对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就因权力斗争而为耶律狼德所害，家人惟有四散逃命。为保护阿保机不受伤害，祖母把他“常匿于别幕，涂其面，不令他人见”。^①以后又发生了耶律辖底靠阴谋手段夺取夷离堇和耶律释鲁遭暗杀等事件。一连串血雨腥风清楚地表明了旧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契丹部落联盟的形式过于松散，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急需进行变革，建立中央集权。而遥辇氏汗权衰落，痕德堇可汗昏聩无能，无力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如曷鲁所言“君臣之分乱，纪纲之统隳。委质他国，若缀旒然。羽檄蜂午，民疲奔命。”^②这就给了阿保机脱颖而出的机会。天复七年（907年），阿保机凭借此前多年征战建立的威信和掌握军政大权的优势，废除传统的选汗制度而即位。这表明阿保机“化家为国”的思想已然形成并付诸实施了。

然而，阿保机面临着如何在契丹人中间维持其最高权力这一难题。他试图加强其绝对权威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他的弟弟们与其他耶律氏的贵族。按惯例，契丹首领每三年需要重新选举一次，阿保机却没有履行这一程序，这使他的弟弟们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要阻止他建立一个父子相传的世袭王朝，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

① 《辽史》卷1《太祖上》，第1页。

②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第1221页。

失去取得汗位的机会。

太祖五年（911年）五月，阿保机诸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等阴谋改选可汗，安端的妻子粘睦姑向阿保机告发了这件事。双方作出妥协，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出刺葛为迭刺部夷离堇”。^①太祖六年（912年）十月，在辖底怂恿下，诸弟乘阿保机亲征阻卜之机，带兵阻其归路，逼他重新选举。阿保机抢先燔柴告天，造成连任的既成事实，迫使诸弟各遣人谢罪。

经过一番较量，诸弟认识到靠传统已经不能约束阿保机。太祖七年（913年）三月，诸弟私下拥立刺葛，企图用武力夺取汗位。迭刺和安端始称入觐，欲劫持阿保机。阿保机识破其诡计，拘捕二人。寅底石攻打阿保机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曷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命北宰相迪里古为先锋进击之，刺葛率兵逆战……伏发合击，遂大破之。刺葛奔溃，遗其所夺神帐於路，上见而拜奠之。……五月甲寅，奏擒刺葛”。^②这次叛乱可以看作革新与保守之争，虽然给契丹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但是反对派也暴露得比较彻底。阿保机采取了不同以往的严厉措施，处死了辖底等叛乱贵族 300 余人。

《新五代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诘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乃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

^① 《辽史》卷 1《太祖上》，第 5 页。

^② 《辽史》卷 1《太祖上》，第 6-7 页。

立，不复代。”^①

对于“盐池宴”的真实性，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②然而，这一戏剧性的事件颇符合当时“太祖初受命，属籍比局萌觊觎，而遥辇故族尤觖望”^③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诸弟之乱”就因有众多旧贵族参与，以致经此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④当阿保机的力量因“诸弟之乱”受到削弱之际，各部旧贵族很可能联合起来，逼迫阿保机恢复旧制。在这种形势下，汉人的作用就凸现出来。虽然阿保机掳掠了大量的汉人，但并没有强迫他们做奴隶，而是“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使之“各有配偶”“各安生业”。^⑤因此，在阿保机“化家为国”的思想实践中，他们全力支持阿保机摆脱旧制的羁绊。借助汉人之力，阿保机得以用铁腕镇压反对派，推动改革走向了成功。

随着地位的巩固，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6年）正式称帝，国号契丹（947年改称辽），建元神册，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建立了世袭皇权。

神册三年（918年），阿保机“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⑥阿保机采纳耶律倍的建议，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既有利于借儒家的伦理道德来维护中央专制的统治，也有利于增强汉人对契丹政权的认同。阿保机强调“佛非中国教”，否定了群臣祀佛的主张，反映了他认为契丹政权属于中国和他要做一个“中国天子”的思想。在天赞三年（924年）的诏书中，阿保机更明确地宣称自己“上承天命，下统

①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6-887页。

② 参见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辨》，《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任爱君：《契丹“盐池宴”、“诸弟之乱”与夷离董任期问题》，《史学集刊》2007年第6期。

③ 《辽史》卷73《耶律海里传》，第1227页。

④ 《辽史》卷2《太祖下》，第16页。

⑤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第886页。

⑥ 《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209页。

群生”，要成为“万载一遇”的“圣主明王”。^①

三、“因俗而治”

经过阿保机多年扩张，契丹境内民族众多，且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大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汉人和渤海人；一是“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和其他游牧部族。^②在这样辽阔的疆域内，对众多发展不平衡的民族实行单一制度无疑是不现实的。因此，阿保机汲取了历史上华夏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因其俗，简其礼”^③的政治智慧和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民族分治”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④的“因俗而治”思想。

唐末，大量被掳掠的和逃避战祸的汉人流落契丹，绝大多数流入了迭刺部。“阿保机的迭刺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草原外缘的新区域。这一区域是极富汉风的契丹。”^⑤《辽史》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离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⑥迭刺部习染汉文化较多和阿保机的父祖对农业生产价值的重视为他“以汉制待汉人”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起初，阿保机建“汉城”来安置汉人，让他们能继续从事农耕，以便获得最大的利益。如天复二年（902年），阿保机下令于黄河南筑城，安置征伐河东、代北所获生口。据传韩延徽出使契丹，为阿保机器重留

① 《辽史》卷2《太祖下》，第19页。

② 《辽史》卷32《营卫志中》，第373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80页。

④ 《辽史》卷45《百官志一》，第685页。

⑤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⑥ 《辽史》卷59《食货志上》，第923-924页。